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 (1937-1945)

[韩]陈细晶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以战时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为中心,重点探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媒体文化转变的影响。文中根据战前国民政府与上海民营报业的关系及其对国民政府战争动员的影响,集中阐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直接控制上海报业,钳制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因此,战时上海媒体文化转变后所做的宣传,既不为中国人民所信任,也无法配合汪伪政府的战争动员,更无力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政策。

关键词 媒体文化 战时日本帝国 汪伪政权 上海报业 战时动员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时,就将上海报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控制对象。因为抗战爆发前,上海报业已是报业的领头羊;而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迫切需要中国媒体来说服中国人民配合日本的侵华战争。当时,日本侵略者试图用“中国人只有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才能从西方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①的类似宣传口号,以调动或说服中国人配合日本的“大东亚战争”。但是,在1941年12月7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军对上海报业的控制仍是困难重重;其后,日本则接管了上海的主要报纸,并通过汪伪政权实施报业管制。上海报业从以民营报纸为主,在1941年12月后变为官营为主^②,且大多成为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的宣传机器。学术界普遍认为,1941到1945年是上海报业的“黑暗期”或“屈辱的年代”。^③叶文心和安克强教授指出:其实,上海公共媒体的常态性本身就是“在敌军检查机制和国家宣传机器夹缝中寻求几许言论自由的一种极端的重构产物”。^④虽然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较国民政府更加强有力地控制上海报业,但实际控制和宣传工作并不顺利,收效甚微。本文主要根据战前国民政府与上海民营报业的关系及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报业结构之转型,重点阐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直接控制上海报业,钳制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以配合日本帝国侵略扩张政策而终归失败的实践与过

- ① Barak Kushner, *The Thought War: 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p. 119.
- ② 杨天石、黄道炫编:《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Poshek Fu, “Ambiguity of Entertainment: Chinese Cinema in Japanese-Occupied Shanghai, 1941-1945,” *Cinema Journal*, vol. 37, No. 1 (Autumn, 1997), pp. 66-84.
- ③ Marie Claire Bergère, *Shanghai: China's Gateway to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87-322; 马光仁著:《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5-990页。
- ④ Christian Henriot and Yeh Wen-hsin, “Introduction,”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

程。

一 上海报业结构之转型

1937年之前,尽管国民党高层官员如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以创办新刊或收买股份的方式渗进上海报业,但《申报》、《新闻报》、《时报》之类的商业民营报纸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①上海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闻报》,由史量才、秦润卿、何联第、叶琢堂、吴蕴斋、汪伯奇、钱新之等上海资本家和实业家所控制。^②当时,上海报业的核心人物是《申报》的老板史量才。他不仅是上海日报公会会长,对上海其他日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他还是一个很有魄力的金融家。^③通过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如参加同乡会、公会活动,史量才与上海政治精英、资本家、知识分子都广结善缘。^④当时上海很多知识分子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各种文章,实际上发挥着舆论导向者的角色,特别在他们各自的单位、社团、同乡会的圈子内起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抗日舆论在上海风气云涌,史量才便通过上海报业的知识分子凝聚了这种抗日情绪,群起攻击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对日绥靖政策。他的影响力和宣传抗日活动,直接威胁到了当时国民政府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结果在1934年末,他被蒋介石密令暗杀。^⑤

鉴于上海报业在全国舆论导向方面的领军地位,国民政府千方百计地试图控制上海的主要报纸。为此,国民政府颁布了新闻法,设立了上海新闻检查局,实行事前检查和事后审稿。尽管如此,当时上海主要的报纸还是由上海资本家和实业家所控制,国民政府的新闻管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与这些报刊实业家、经营者,就报纸发行问题、宣传内容等方面进行协商和讨论。在这种媒体运营机制下,国民政府与报业经营者都有回旋余地,即国民政府可以藉此阻止一些极端言论的形成和出现,报刊实业家和知识分子亦可借此来影响和引导公共舆论。^⑥与后来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的报业控制相比,这种报刊运营机制尚不失为一种良性的媒体运行模式。

日军于1937年11月占领上海后,无论使用何种手段,如以逮捕、政治恐怖抑制抗日记者和抗日媒体的活动,但各种抗日报刊仍顽强地存在下来了。这主要是因为报社大多位于日军势力无法介入的上海国际租界内,而报社可以用英国或美国国籍注册运营,以躲避日本侵略者的管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正式接管上海国际租界,从而宣告了日军包围租界的孤岛时期(1937-1941)的结束。^⑦此后,日军和汪伪政权可以任意处置上海各大报刊,并首先查封和接管了

① Sei Jeong Chin, "Politics of Trial, the News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s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New Life Weekly Case, 1935," Dillion, Nara, and Oi, Jean, eds. *At the Crossroads of Empires: Middleme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e - building in Republican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Q430-1-261.

③ 黄炎培:《史先生之生平》,《申报月刊》第3卷第12期,1934年12月。

④ 1932年上海事变以后,史量才与上海的精英们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并在行政上与财政上支持抗日军队。事实上,正是通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等的活动,史量才获得广泛的社会关系网。详见 Brian Mart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 - 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110-112.

⑤ Frederic Wakeman,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179-182.

⑥ Sei Jeong Chin, "Politics of Trial, the News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s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New Life Weekly Case, 1935"; [韩]陈细晶:《1930年上海媒体与公论形成的习惯》,《东洋史学研究》2009年9月号。

⑦ Robert Bickers, "Settlers and Diplomats: The End of British Hegemony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37-1945,"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 eds.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申报》和《中美日报》之类的抗日报纸。^①至此,民营报纸在上海报界已无力与政治势力对抗。

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接收《申报》等,直接导致了上海报业的结构转型。其中,《申报》和《新闻报》是以美国国籍注册的,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外籍身份反而为日军接管这些报纸提供了合法性。史永康,即史量才的儿子,曾继任《申报》老板,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决定离开上海移居香港。他将《申报》的经营权转让给了美国律师阿乐满。阿乐满之前是该报的编辑兼法律顾问,也是史量才的挚友。据阿乐满说,他在1941年之前,作为《申报》的主编,对这份报纸仍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为了减轻负债,他成立德拉瓦州美国公司,而报纸则挂在公司名下运营。在这种背景下,《申报》当然持亲美抗日的立场,自然也就为日本占领军所不容。^②1941年12月,当日军接管上海租界时,便借《申报》和《新闻报》以美国国籍注册为由,查封和接管了这两家报纸。即是说,1941年以前《申报》和《新闻报》为了寻求法律庇护,以美籍注册,而这种外籍名分,在1941年12月的国际政局演变中,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反而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查封和接管的所谓理由。在中国传媒史上,日军接管上海最大的两家报纸,标志着中国最大的上海民营报纸,首次变成了日伪政治势力的喉舌。从此,上海资本家、实业家控制上海报纸的时代结束了,而日本侵略者接收民营报纸则预示了上海民营报纸的衰落。

日本侵略者接收《申报》以后,并没有直接经营,而是找汉奸代理。日本侵略者在1942年12月8日委任汉奸陈彬和为《申报》社长,随后又任命汉奸吴蕴斋为《新闻报》理事长。陈彬和,曾在香港和上海为日本侵略者从事情报工作,因而得到日本人的信任。^③不过,他变为汉奸却是个意外。因为战前陈彬和作为《申报》主笔,力挺抗日舆论,并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史量才被暗杀以后,《申报》转变了原来的态度,很多激烈的分子,纷纷退出”,陈才不得不离开《申报》而去香港。^④像其他汉奸一样,陈彬和可能与蒋介石有很深的个人积怨,但不论其中有何缘故,事实是上海报业已由此完全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掌中之物。

虽然《申报》由陈彬和主管,但日本侵略者还是经常干涉《申报》的经营和言论,因此,该报已毫无独立性可言。每个月,陈彬和会收到陆军军票50万元的津贴。^⑤在其出任《申报》社长之前,日本陆军报导部长就经常干涉《申报》的人事管理、经营及编辑工作。^⑥陈彬和出任社长之后,更是直接邀请日军代理人吉田东祐为申报的顾问,撰写社论,然后翻译成中文发表在《申报》上。^⑦毫不夸张地说,在此时,政治势力对《申报》的干涉是史无前例的。在日本侵略者的严格操控下,特别是汪伪政府1943年宣布参战后,《申报》完全沦为日本和汪精卫政府的喉舌及宣传工具,成了为“总体战”实施政治、经济、文化动员的宣传中心。1943年2月13日的《申报》社论中,有一篇题为“实践总体参战的前提”的社评,毫无掩饰地鼓吹:“参战以后,国府对于一切设施,只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适应新的政治需要,全力协助日本保卫东亚的任务顺利完成。”^⑧

现在看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后是日本侵略者而不是国民政府实现了对《申报》的全面控

① 马光仁著:《上海新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Publication of Shen bao” and “Memorandum re Shun Pao,” Stanford Hoover Archives, Box 22-19, Shun Pao, 1943-1945.

③ 《上海市政府致江苏高等法院的检查所函》1946年9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Q187-2-307。

④ 朱子家(即金雄白,下同)著:《一个亲日报人的另一面》,《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春秋杂志社1964年版,第140-145页。

⑤ 《上海市政府致江苏高等法院的检查所函》1946年9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Q187-2-307。

⑥ 马光仁著:《上海新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37页。

⑦ 顾晋琦:《陈彬和在〈申报〉的行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

⑧ 《申报》1943年2月13日。

制。抗战前期,《申报》在对日外交政策上,一直对国民党政府的绥靖政策持批判态度,使其头痛万分。事实上,国民政府也曾绞尽脑汁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图控制《申报》,但都不是很成功。上海当地精英对自己传媒报业的控制还是很牢固的。即使在史量才被暗杀后,《申报》也还是在他的儿子手中,国民政府并未占到多大的便宜。然而,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申报》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变更,这原本是国民政府一直梦寐以求却不曾得到的一个结果。

除日本直接控制的报纸以外,在上海传媒界,当时汪伪政权直接控制及经营的报纸也逐渐地占据优势地位。《中华日报》是汪伪政府最重要的宣传口舌,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担任该社社长。林柏生曾任汪精卫的私人秘书,1932年来上海开办《中华日报》。不过,战前《中华日报》的规模很小,与《申报》或其他的主要报纸根本无法竞争,因此,在上海报界地位不是很高。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华日报》摇身一变成为上海最大的报纸。这类报纸还有1940年9月由周佛海派系创办的《平报》,以及日本亲自创办的《新申报》及《新中国报》等等。颇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报》的社长竟是中共地下党员袁树。

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报刊表(1944年)^①

	创刊时间	社长	政治派别	发行量
《中华日报》	1932年4月21日	林柏生、许力求	汪精卫系	50000-60000 ^②
《申报》	1872年4月30日	陈彬和	日本(海军、陆军)	
《新中国报》	1940年11月7日	袁殊	兴亚建国运动(日驻沪临时使馆控制的情报机关) ^③	50000 ^④
《新闻报》	1893年2月17日	吴蕴斋	日军(海军、陆军)	
《平报》	1940年9月1日	金雄白	周佛海系	
《国民新报》	1940年3月22日	李士群、胡兰成	李士群系	15000-20000 ^⑤
《新申报》	1937年10月	尾阪与市	日本	20000 ^⑥

由前述可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上海报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过去统领上海报业那些民营报纸大多都衰败了,而那些在日军和汪伪政府控制下的报纸开始突起。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遥控的报纸开始统领商业报纸。

二 汪伪政权的新闻管制政策

除接管上海最大的报纸,逐渐消灭民营报纸,以确立半官营报纸的优势地位外,日军和汪伪政

① 这些报纸都是上海市新闻联合会的会员;《申报年鉴》1944年版;Allan Norwood, Box 22-29, Shen bao,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马光仁著:《上海新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郭秀峰:《汪伪时期的〈中华日报〉》,《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③ 朱子家著:《抗战前后上海报业概况》,《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春秋杂志社1964年版,第139-140页。

④ 马光仁著:《上海新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3页;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6页。

⑤ 蒋晓光、林达祖、沈立行:《李士群与国民新闻报社》,《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页。

⑥ 马光仁著:《上海新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7页。

权还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在这方面,汪伪政府继承了国民政府的衣钵,当然日本人也带来了日式新闻制度。可以说,1941年后上海的新闻制度是国民政府的旧模式和日本侵略者的新套路的一种杂交。

首先,汪伪政权继承了一直以来备受指责的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日军占领上海后的1937年11月28日接收了在租界内南京路上的上海市新闻检查所^①,开始其新闻检查。当时,维新政府和伪上海市政府也都派人到检查所实行新闻管制。^②但因为不是很有效,所以在1940年12月16日汪伪政权的宣传部直接接管了上海新闻检查所。^③戴维巴雷特指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欧洲合作政府不同的是,汪伪政府并不试图跟以前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在理念和政策上划清界限,因此,汪伪政权和国民政府在政策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④

因为新闻社位于租界内,像国民政府一样,汪伪政权在实行检查的过程中需要与上海工部局合作。1941年9月,汪伪宣传部指出《宁波公报》和《中国商报》违反新闻管制法,要求上海工部局的警察局提供相应协助。但是,上海工部局并非积极地与之合作。^⑤针对前述伪上海市政府的请求,上海工部局如此回复:“以种种困难,未能即如所请,唯鄙人保证警务当局当予尽力协助,制止租界各报纸作任何不利之政治宣传。”^⑥这种“软钉子”的态度,既可能是上海工部局确实无力满足伪上海市政府的前述要求,也可能是上海工部局在日军占领上海时期想尽力维持中立立场而不愿意多介入中日纠纷。但不管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汪伪政权与国民政府一样,无法实施有效的新闻管制。日军完全占领租界,并委托汪伪政府管理租借后,情形就大为不同了。虽然汪伪政权和日军也需要上海工部局的协助,但总体而言,实行新闻检查就容易多了。^⑦

汪伪政权与国民政府虽在新闻政策上具有连续性,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毕竟引起了中国沦陷区新闻政策的变化。在中国沦陷区新闻政策转变上,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日本侵略者的痕迹。格雷戈里·凯萨丝教授在关于日本战时的国家和媒体的关系研究中,提到日本战时有两个新闻政策。第一,就是在一种顾问制度下以开“咨询会”的方式,促进官僚与报纸经营者的直接接触。在会议上,官僚经常会就一些时事报道提出警告,或提出检查标准等非强制的指导。^⑧1942年2月,日本政府设立“新闻会”等组织,控制其人事权,规定报社的经营、编辑、合并、转让、出售、记者登记、影印、未编报纸和其他资源的分配等,都在政府的管辖范围内。在这种制度下,日本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必要时直接控制新闻会。^⑨第二,合并报纸。因为报纸的数目越少,越容易抑制竞争,也节

① 上海新闻检查所成立于1933年3月,由上海市政府、国民党和上海警备司令部派遣人员组成。《上海市年鉴》1936年版,T47。

② 《检查新闻工作报告书》1938年5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R1-2-454。

③ 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R1-18-660;国家第二档案馆藏,卷宗号:汪伪宣传部2040-89。

④ David Barrett, “The Wang Jingwei Regime, 1940 - 1945: Continuities and Disjunctures with Nationalist China,” David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 ed. *Chinese Collaboration: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with Japan, 1932 -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02-115.

⑤ 《上海工部局函上海市政府》1941年1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R1-18-660。

⑥ 《上海工部局函上海市政府》1941年1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R1-18-660。

⑦ Robert Bickers, “Settlers and Diplomats: The End of British Hegemony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37-1945,”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 eds.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⑧ Gregory Kasza, *The State and the Mass Media in Japan, 1918 - 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173, 185.

⑨ Gregory Kasza, *The State and the Mass Media in Japan, 1918 - 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16-217.

约原本就缺乏的资源,更有利于对新闻内容的控制。^①格雷戈里·凯萨丝解释说:这种现象是因为,一方面战时国家权力的扩张使得国家更有能力对媒体进行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战争本身也为这种战时新闻政策的提供了合法性,如节约资源等理由。^②日本政府的新闻管制政策,成为了汪伪政府新闻管制的重要参考模式。

汪伪政府在1943年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采用与日本新闻政策相似的管制模式。第一,汪伪政府合并了大量的的小报。因为经常弄点娱乐新闻、文学小说,以及小道消息自娱自乐,所以,各式各样的小报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颇为走俏。1943年后,汪伪宣传部借统制和节约战时经济资源的名义,整顿这些小报,并规定2到4家小报合并为一家报纸。^③合并之后小报的数目从19家降至9家。^④从此,小报就变得更加容易控制了。第二,1943年1月成立上海市新闻联合会,其成员多为上海主要报纸的社长、总经理和总编辑。这个联合会的目的在于通过采取统一的编辑政策,共同协商计划出版物与广告经营,以这种确保资源共享的形式,保证报业和日军以及汪伪政权的沟通和联系。^⑤其实,战前上海日报公会发挥着与上海市新闻联合会相似的职能,但其性质有很大的差别。上海日报公会是民间自治组织,而上海新闻联合会是日军和汪伪政权遥控的半官僚组织。这些举措,无疑都使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对上海报业的控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三 上海报业结构转型的目的及其失效

通过对上海报业的结构调整,日军和汪伪政府认为他们可以通过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动员中国人协助日本完成总体战。事实上,随着上海报业本身结构的转变,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政治势力和媒体关系也随之产生了重大变化。此前国家与社会控制媒体的天平,现在偏向了国家一方。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战前那些颇具影响力的抗日资本家和精英在1941年以后,被日军以各种方式清除出局了。结果表面上看,报纸在日军和汪伪政权说服和动员中国人民方面,似乎非常卖力,但实际上各种研究表明其宣传动员并没有什么成效。

尽管测定媒体效应不太容易,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人对战时动员的反应来间接推测出其政策是否有效。日本在青岛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人更加信任来自重庆政府播发的新闻而不是日本新闻社的消息。调查还发现战前年轻人虽然因为抗日宣传的影响而对国民政府心存不满,但仍旧支持重庆政府。^⑥甚至汪精卫派系的官员也对自己与日本合作怀有强烈的负罪感和担忧。^⑦1941年日军完全占领上海后,更没有知识分子愿意和日本人合作。^⑧而那些愿意给日本人做事的

① Gregory Kasza, *The State and the Mass Media in Japan, 1918 - 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188.

② Gregory Kasza, *The State and the Mass Media in Japan, 1918 - 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16- 217.

③ 《中华日报》1943年1月17日。

④ 《汪伪政权全史》第二卷,第886- 887页。

⑤ 《申报年鉴》1944年版。

⑥ Kubo Toru, "The Koa in," Stephen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Vogel,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4- 64.

⑦ Poshek Fu,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 -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28.

⑧ Poshek Fu,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 -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5.

人,一般是跟汪精卫党派有私人关系的,或者对中国抗战抱有深悲情绪的人。^①另外,日军和汪伪政府在经济动员上也没有多少收获。近年来,学者们对战时上海经济的研究似乎达成了共识:尽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以及合作者都满怀信心,但日军和汪伪政权在获取战争资源方面并不太成功。^②为什么日军和汪伪政权控制媒体那么彻底,但在说服和动员中国人方面却没有相应的功效?笔者认为:不管媒体系统如何变化,中国人民尤其是上海市民,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由媒体的酝酿,形成的抗日情绪强烈而持久,因此,欲使中国人民与日本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当年国民党大力压制抗日舆论时,上海报纸还是在高举抗日的旗帜。因此,1941年之后的媒体系统在日军统治下虽被再次调整,但在动员中国人民配合日本的侵略战争方面仍是非常失败。

其实,日本人就如何贴近中国国情进行宣传,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如,大部分的日本战时宣传理论家都认同,从基层社会发出的、由下至上、大众自己形成的宣传模式,从长远来看,总会是最有效的。^③巴拉克·库什纳亦指出:日本占领军对于中国人的爱好非常用心研究,为此做了很多关于宣传广告效率性的问卷调查。^④但总体来说,日军还是认为寻求在媒体的经营上与中国人合作,要比从基层来管理社会舆论重要的多。事实上,汪伪政权也试图培养自己的群众基础,从而自下而上地建构公众舆论。如,日军虽然监控各地报业,但其当时也确实尝试并努力适应中国国情,且试图采用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群众来说都很重要的政治话语。汪伪政府宣布参加二战的翌日,《申报》随之就发表社论请求“树立战时政治体制”,并认为这次宣战是中国对英美近百年来殖民地侵略历史的终结。^⑤1940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论,就是试图将日军占领区的反帝国主义、寻求民族独立的愿望和日本妄图称霸亚洲的野心揉合在一起。^⑥

当然,日本侵略者也得给汉奸们找些宣传理论。《申报》的社论呼吁为了实行参战政策,政府必须尊重民意,因为“如果没有得到人民自动地积极地参加和拥护,决不会顺利完成”。^⑦因此,《申报》社论请求“真正吸收民间各方面的人才,树立完整的民意机关”。^⑧这样的话,不禁使人回想起战前进步知识分子对南京政府的诉求。同时,为了吸引中国知识分子,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也时不时诉诸于民族主义。如,他们在阐述战时文化政策的纲领时,如此说道:

战时文化政策,主要的任务是动员全国的人民,参加保卫东亚解放中国的战斗。因此,这个政策纲领,必须是具有积极性的和建设性的,要使中国文化得到弘扬和发展。特别是在目前中国,经过了长达六年的战乱,长期的动荡和不安,文化事业早已陷于消极停滞状态,所以战时文化政策纲领,首先必须多方面辅导国民文化事业,鼓励和发扬民族文化,扩展文化部门的一切战时设施,使全国人民进入崭新的文化园地。在这园地里,认识世界,认识时代,认识自己的

① Poshek Fu,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9

② Christian Henriot, “Shanghai Industries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Bombs, Boom and Bust (1937-1945),”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45; Parks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Wartime Shanghai, 1937-1945: A Case Study of Rong Family Enterprises,”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 (2004): pp. 46-65.

③ Barak Kushner, *The Thought War: 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p. 9.

④ Barak Kushner, *The Thought War: 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pp. 117-155.

⑤ 《申报》1943年1月10日。

⑥ Peter Duus,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xxv.

⑦ 《申报》1943年1月9日。

⑧ 《申报》1943年1月10日。

祖国,分清真正的敌友,旋而启发人民自愿地投入到为国家为东亚的解放事业中来,这是确立战时文化政策纲领的前提。目前,从国家的立场来说,这场战争是反对英美奴役中国的战争,因此中国战时文化政策,主要的是适合于动员中国人民力量的文化政策,它要中国化,要为中国大多数人民所能接受、认可和喜爱。^①

为了说服中国人合作,这篇社论强调文化政策的“中国化”,目的是为了能够找到中国人民所能接受的文化政策。这些都表明日本的确是尽力在寻找中国人可以接受的宣传方法来进行动员。值得注意的是,树立文化政策的主体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人。

为了适应中国的情况和从基层社会构成舆论,日军在经营报业和实行媒体控制方面尽量寻求汉奸的帮助和合作。如前所述,日军委托汪伪政权实行新闻检查,而且汪精卫的一些派系被允许经营自己的报纸。日军管制的《申报》和《新闻报》也都交给了汪伪政权。日军希望与一些中国人的合作,可以促成一种更加有效、更加广泛的协助和动员。尤其从陈彬和被任命为《申报》的社长这一举措,我们可以窥探到日军背后的一些意图。日军期望陈彬和可以用战前做《申报》主笔的经历来引导和影响公众舆论。随着陈的地位上升,后来日军直接任命其为上海新闻联合会会长。^②如上所述,新闻联合会其实是日本人控制中国报业的一个工具,而陈正是通过这个组织来寻求其他报纸的对日合作。

虽然日军不遗余力地试图将陈彬和打造成上海报业的又一个史量才,但陈彬和的立场和力量都难以与史量才相提并论。为什么陈彬和不能像史量才那样影响公众舆论,为日本战时帝国营造社会基础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因为他的名望、地位和权力都来自日军,而他自己没有巩固的地方社会基础。史量才的地位是由他自己建立起来的,他的《申报》,以及他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还有他的政治力量支撑起他在上海的地位。而且,史量才建立起了与知识分子和上海本地精英之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正是这样广阔的社会关系网,才使史量才在战前有资格和能力引领抗日舆论。相比之下,陈彬和的权力来自日本占领军,而他自己没有像史量才那样的社会势力和地位。虽然战前陈彬和通过上海民权保障同盟会和抗日运动,与一些进步人士建立起了联系。但是,因为陈彬和后来投靠了日本人,这些关系也就自然地丧失了。

第二,陈彬和的汉奸身份,使他不能再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而且,他与其他汉奸,如汪精卫派系之间关系也很紧张。这可能是因为他与日本占领军的关系过于亲密。金雄白是周佛海的亲信,曾被周佛海派去接近陈彬和。据金雄白回忆:

我与陈彬和认识了多年,但向无来往,自他由港回沪出任申报社长之前,时常见到他与日本人一起在公共场所出现,我甚至没有与他作礼貌上的招呼。当时汪政权中的部分人士,有着一个奇妙的心理,对过分亲日的人,不但怀有戒心,而且鄙视,内心潜藏着敌意,对于他,我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③

事实上,陈彬和经营的《申报》时不时攻击与讥刺汪伪政府。对于江苏省长陈群任用上海帮会的谢葆生等为高级警务人员,《申报》讽刺此事为流氓政治。这样的报道,当然会引起汪伪政权的反感。^④因为陈彬和与汪精卫派系时不时有些摩擦,对陈彬和来说,要在上海报业得到各种政治派系的协助还是比较困难的。

① 《确立战时文化政策纲领》,《申报》社论,1943年2月15日。

② 顾晋琦:《陈彬和在〈申报〉的行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

③ 朱子家著:《抗战前后上海报业概况》,《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春秋杂志社1964年版,第141页。

④ 朱子家著:《抗战前后上海报业概况》,《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春秋杂志社1964年版,第142页。

简而言之,日军不得不和这些边缘化的中国人合作。因为大部分具有影响力和广泛关系网的精英都离开了上海。正如卜正民教授所指出:中国中原腹地不像满洲或北方,“大多数的地方行政人员或商业人士都选择离开和躲避”,而“留在占领区和政府合作的人决非是最理想的人物,最多是二等或三等的货色”。^①日军是想通过扶植一部分中国人以达到控制舆论和战时动员的目的,但日军找到的人都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来影响舆论,更无法指望能帮助日本帝国动员中国人参战,尽管此时的日军对媒体有着更严厉的控制。

笔者认为,日本占领军以及汪伪政权重新整改的新闻机制,虽然强有力地摧毁了战前那种温和的协商机制,但似乎并没能找到真正能取而代之的相应机制。战前,国民政府和报纸之间就很多事情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地方精英们作为新闻媒体的所有人,可以参与到国家建设和商业化之中。^②1941年后,日军赤裸裸地接收和管制上海新闻媒体,中国知识分子被硬性地从公众舆论中隔离出来。虽然日本侵略者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深厚,但他们似乎忽视或者没能理解透战前那套新闻机制,能够使国家和媒体在公众舆论形成的过程中有效地交流和协商。为了控制新闻媒体,日本占领军和汪伪政府反而完全阻塞了这种交流。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日军看起来已经绝对控制了上海新闻媒体,但在宣传和动员中国人配合日本侵略战争方面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陈细晶,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校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Timothy Brook, “Occupation State Building,” Stephen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2.

^② Sei Jeong Chin, “Politics of Trial, the News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s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New Life Weekly Case, 1935,” Dillion, Nara, and Oi, Jean, eds. *At the Crossroads of Empires: Middleme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e - building in Republican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